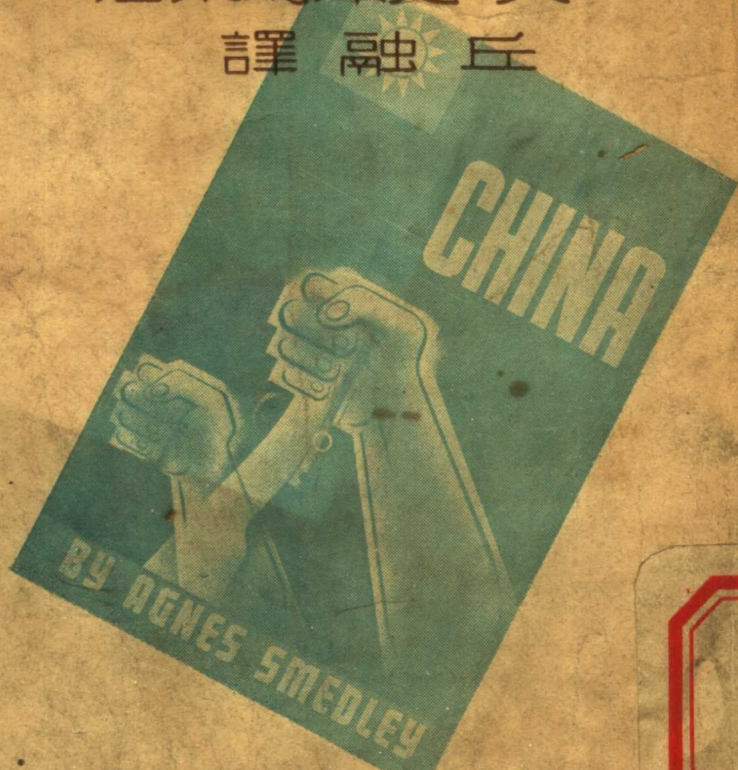


中國之戰歌

美·史·沫·德·萊·薈

丘融譯



展望出版社印行

中國之戰歌

(序曲篇)

美·史·沫·德萊女士著

丘 融 譯

★

★ ★

展望出版社印行

中國之戰歌

(序曲篇)

◀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

實價國幣

元正

著者 美·史沫德萊

譯者 丘融

印行者 展望出版社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



士女萊德沫史 者著書本

獻給

中國的戰士們——他們是

世界反法西斯鬥爭底壯烈的前鋒

譯者前言

史沫德萊這名字對於中國讀者太熟悉了，實在毋須譯者再做什麼介紹。但關於這本書，却有特別值得一提的地方——這也就是逢譯的原委：

記得去年舊金山會議開會的時候，中國代表團的首席某巨公曾經在某次記者招待會上被一個美國記者問及：有沒有看過史氏的這本書。回答是：沒有。

沒有——這也許會使那位發問者覺得訝異罷，因為這是一本報導中國艱苦抗戰情形曾經在美國贏得廣大讀者的暢銷書（本書所根據的藍本即為其第四版）。然而，在中國人看來，巨公要員之不屑讀、不願讀或讀不下本書，毋甯是很自然的。那位美國記者的發問其實可說未免過於天真。

然而，真正的中國人和真正愛中國的人却要感激本書作者，因為她報導了中國新生力量的成長過程，她把中國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後艱苦鬥爭的光景介紹給全世界。雖然都是些根據個人體驗的側面描寫，但字裏行間卻洋溢著偉大的同情與崇高的人類愛。這樣的一本書，中國人是渴望讀，而且也是應該讀的，我們相信。

史氏在中國滯留前後達十四年之久，足跡遍東北、華北、華中、華南，抗戰後又隨軍在各戰場做報導和救護醫藥等工作，至一九四一年才因病回美。這本書因係她滯華期間的紀錄，篇幅很多，全書都四十餘萬言，共分如下十篇：

一、回顧

- 二、中國——過去和現在（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
- 三、帝國主義與革命（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
- 四、統一戰線與戰爭（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
- 五、武漢會戰的最後階段（一九三八年）
- 六、在游擊地區中（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
- 七、遍歷華中（一九三九年晚秋）
- 八、各季政勢（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

九、再跟着游擊隊轉戰（一九四〇年）

十、重慶及其後（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

這本小書不過是原著第四篇的節譯，因為裏面有些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似可自成一書，特冠以「序曲篇」之名，先付梓出書，以饗讀者。其餘部份打算以後陸續譯出問世。割裂之嫌，在所難免，這是對不起原作者和讀者的地方，只好諒補救於異日了。

最後，還有一點感想：

抗戰勝利了，對於某些也許是「坐待」政策的成功，也許大有「從天而降」之感，因此他們便以為又可以安穩地坐在人民的頭上，張開口來「接收」勝利之果而毫無愧容，彷彿他們是註定來「坐享其成」似的。然而，我們試閉目想一想整個抗戰過程，尤其是初期的那種艱難困苦情形，恐怕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也難找到相近的例子罷。想到那時的情景，我們現在還能活著目睹勝利的人其實是應該愧死，真不知要如何加緊推進民主，使勝利不為極少數人所獨佔才能對得起那些已死者！

還有，史氏所寫下的見聞雖然不足以構成一幅完全的圖畫，但故事裏面交織着血和淚，很多是有其不磨的價值，足以做寫抗戰史的人參考的。

中國之戰歌

一九三六—三七年

目 錄

譯者前言

西安事變.....一

人物和思想.....三三

戰士羣象.....三八

戰 爭.....五二

西安事變

一九三六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在魯迅先生的家裏碰見一個剛從西北到上海來的作家兼紅軍代表。他曾經參加過那更詩式的長征——整個軍隊橫越一萬二千哩平原、河川和山嶽的歷史性的行軍。

有好幾個星期我每天晚上和他坐在一起，把他的話筆記下來。他的敘述雖然平靜而着重事實，但是話語間却充滿着無數難於置信的痛苦和堅忍的畫面。當提到在西藏東部通過大雪山時的漫長的跋涉，他會這樣說：

「我們疲倦到了極點，有時當我們蹲下來解手的時候我們竟然乏力到站不起來，許多人都凍死了。有好幾個月我們只有包穀喫；有很多人消化不了它，喫下去還是整個從大便裏出來。別的人檢起來，洗乾淨了又拿來充飢——然而還是照樣地整個排出來……」

「當我們沒有死掉的一隊人最後到達甘肅省的平原地帶看到我們的同胞時，我們都不禁伸開兩手去擁抱他們，帶着眼淚和歡笑。我們那時只穿著破布或者獸皮，要不然就是用羊毛草草綑湊起來的皮塊。我們瘦得簡直像一個個的骸骨；而且許多人都得了病。咳嗽的聲音在萬籟俱靜的夜

裏到處可以聽見。甘肅是一個非常窮苦的省份，我們有時不得不宰狗，貓和老鼠來喫。有時候那裏的女人要躲起來因爲一家人只有一條共同的褲子，而那條褲子剛巧給丈夫穿去了。幾十年的戰爭，飢饉、旱災，苛捐雜稅使那地方的老百姓連衣服也沒有得穿。除了極端貧困之外，那裏還有僱傭軍隊和北方的蒙古人所散播的梅毒流行。很多人都喪失了生殖的能力，並且有些地方簡直看不到有十五歲以下的小孩子。」

他告訴我那裏多麼迫切地需要醫藥品，兩個醫生和我便開始募捐，並且替紅軍做了「藥品走私者」。

那時候我又病倒了，和朋友們商量以後便決定去那唯一不受藍衣社暴徒威脅的地方——在張學良將軍治下的西北去。從他開始做東北的軍閥起，這位少帥的性格曾經有過很多的變化。阿比西尼亞的被侵佔打破了他對義大利法西斯的崇拜，並且因爲受了他部屬中年青幹部的影響，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傾向民主的人。他那時已經戒絕了鴉片並且極力想擺脫他青年時代的封建和軍國主義的影響。全國其他各地都被禁止的救亡運動，在他的地區裏却受到保護，並且曾經不顧中央政府屢次抗議，在西安允許開一次救亡會議，他雖然接到過政府命令要他繼續去消滅那已經開到西北的紅軍，他和他的部隊都不願意同胞自相殘殺，因爲那時候日本人已經佔領了他們的老家——東北，並且正在侵佔綏遠。

張少帥的一位非正式的工作人員——替我在臨潼（離西安約十五哩）準備了一個廟宇，讓我在裏面休養和工作。這裏就是中華民族搖籃地帶的大西北的中心，在那裏有過中國好幾個大朝代興亡的史跡。就在那裏我希望恢復我的健康並且再寫一本書。

我住的那間廟就是唐玄宗（統治時期是：西歷八四七——八五九）的寵幸楊貴妃的宮苑。凝神望着那貴妃的亭閣，那蓮花池和迴橋，我不禁想起有一次我聽到一個中國老樂師和着琵琶唱的一首歌。他當時彈唱的聲音像一個小樂隊般充滿着整個屋子。那就是描述玄宗和楊貴妃故事的「長恨歌」。

在這樣的氛圍氣中我讀中國的歷史並且再開始唸我那一曝十寒的中文。當我的健康有了進步時，我時常溜到鄉村那邊的秦始皇陵墓邊去。

回到廟裏去，我便着手寫我那本新書，只有當朋友們從西安來打破我的寂寞和帶些消息給我的時候，方停寫一下。朋友中有一個是從紅軍那裏來的；他所帶來的消息總是使人焦躁不安的。傅作義將軍，綏遠的省府主席那時正在和侵入內蒙企圖切斷中國與蘇聯通路的日軍作戰。日本人同時並佔領了青島。中國政府不但沒有抵抗並且集中最精銳的部隊由胡宗南將軍指揮去對付西北方面的紅軍。在通到這個新戰場的各條道路上都築好了軍火庫，前線已經有過好幾次激烈的接觸戰，胡將軍已經喫了幾次敗仗。北方和西北的將領曾經開過一次軍事會議討論政府圍剿紅軍的命

令，然而封建性的腐敗與互相矛盾的利害關係使他們的努力往往毫無結果。張學良將軍以東北軍比較其他大多數的部隊都現代化得多，而部下的官兵都要跟日軍作戰。

反共的聯合戰線沒有組成，抗日的統一戰線却在形成中。這個統一戰線包括紅軍、東北軍和楊虎城將軍所統率的西北（即十七路）軍。代表們正和其他的部隊談判邀請他們加入這個陣營，同時，半獨立的南方省份廣西的代表團那時已經到了西安。

許多平津學生已經參加了張將軍的新學生軍校。××社的西安代表葉××將這種種情形都報告了上峯。當委員長譴責張將軍，說他在他的軍校裏窩藏共產黨份子時，張將軍說他判別學生的唯一準則是他們的抗日情緒。『請勿妄信日人之謊言』，他在末尾說。

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某一天，有三個剛到西安的學生給藍衣社綁架去了，關在國民黨的總部裏。張將軍曾派兵衝到裏面去釋放了那幾個學生。諸如此類的事件正是暴風雨前的預兆。

這時候還有別的消息擾亂我的安居生活。十月二十日那一天一個住在廟裏的中國女朋友——她是一個似乎不大懂政治的淑女——跑到我的屋子裏來垂頭喪氣地對我說：

「我們中國的損失真多。現在我們又遭遇了一個——我們偉大的作家魯迅先生逝世了。」

我自己父親逝世的消息不久以前，我才接過，我曾經爲這事覺得很傷心；對於魯迅先生之死我却覺得不僅是一件引起個人悲哀的事，並且也是一個民族的不幸。他的一生並不是無目的地虛

渡過去的，他也沒有把生命虛耗到追求財富、權力、地位等方面去。在同時代的中國智識份子中間他對青年的影響可說最大。在他的身上體現着人類的美德；奪去他生命的病正是他在艱苦搏鬥的過程中加劇的。死，對於他是毫不足懼的東西。

只有當他逝世的消息傳出了以後，官方的檢查官才允許他的名字公開發表。他的葬儀在上海舉行，可以說是一個使人永遠不能忘記的場面。那一天，教員和學生離開了他們的課堂，店員離開了他們的商店，工人離開了他們的工廠，甚至那些窮困的作家，藝術家和劇人也從他們秘密的寓所裏跑到街頭去執拂，孫夫人宋慶齡也在送殯的行列裏。

魯迅並不是一個共產黨員，然而共產黨員們都敬重他的廣博的學識和戰鬥精神。在他們的心——延安，他們後來成立了一個最初的魯迅圖書館；我就做了裏面外國語言部的管理人，並且將我在中國搜集的所有私人藏書捐獻給該館。過了不久他們又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從全國各地都有很多知識青年跑到那裏去在最好的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劇人之下學習。這就是全中國唯一的產生過有生命的富於戰鬥性的藝術學府。

當西安的朋友在魯迅逝世後的那一天到臨潼來的時候，甚至那廟宇的經理——一個沒有多大想像力的商人——也進來和他們談論起魯迅。我一面在聽着他講，知道甚至這樣一個僻遠的鄉間廟宇的主人也曉得魯迅的生平和著作，我一面不禁暗自問道：「層層的檢查封鎖有什麼用呢？」

妨礙我寫我那本書的還有其他的事件。十月底我聽到張將軍和委員長之間另一次衝突的傳說。據傳委員長曾經再次譴責張將軍說他剿匪不力，而張將軍據說曾經這樣答覆他：

『我和我的部屬都會多年忠實地服從你，相信你的領導我們抗日的諾言。但是你並沒有實行。現在時機還不太遲，我們現在要求你給與我們以驅逐日軍出中國的權利和機會。我目前對於部下約管束已經沒有多大把握了。』

幾天之後幾個穿中央軍服裝的年青軍官到臨潼的我們廟裏來，要所有的人馬上搬出去。原來那座廟宇是準備給委員長和他的衛隊住並且做『剿匪軍事會議』（預定於十二月七日召集）的會場用的。所有在通到西安的公路上的鄉村也接到命令限期遷出。

我於是和我那位中國的女朋友乘車到西安去。公路上塞滿着搬家的人羣，背着或者用獨輪車推着各自的行李傢具走。徵調到的民工正在那裏鋪路，連路上的小洞也一個個填滿。『剿匪軍事會議』顯然不是一件受老百姓歡迎的事件；因此人民是不被信任的：公路附近的鄉村都給密探佔住了起來。我於是又想起古時候權貴的庭臣往往藉阿諛諂媚表面裝作服從其實貪圖私利的事。雖然我相信委員長是一個酷愛權力的國家主義者，但是我却從來並不以為他是一個非要他路上的小洞一個個都得填平的領袖。他的權貴左右無疑地是在阿諛諂媚他。

我在西安招待所，市內最現代化的一個旅館裏租了一個房間，準備在那裏住一個時期才回到

廟裏去。但是在幾天之內，旅館裏面都住滿了委員長的高級將領；同時我知道好幾百的藍衣社員已經在市內各處成立了秘密的中心。據說他們擁有機關鎗、步鎗和秘密的無線電台。邵力子——曾經是中共的領袖，後來是委員長的秘書——是當時陝西省的主席，他在市內有自己的衛隊，同時警察也屬他指揮，國民黨黨部——當地最不受民衆歡迎的機關之一——也被武裝了起來。

當軍事會議在臨潼召開的時候，西安的空氣頓時緊張了起來。每天我聽到報告說：委員長，在逐一召見東北軍高級將領，答應給他們以金錢和位置假如他們願意繼續內戰的話。他們回答他說他的老家已經給敵人侵略了，家屬被敵人屠殺的屠殺，房屋被敵人強佔的強佔。他們後來並且都向「少帥」一一報告。

一天早上，我那位紅軍的朋友突然到我住的地方來借我的手鎗和子彈。他說：從種種的情形判斷，藍衣社份子在西安警察局的協助下正在計劃暴動，假如果真成爲事實的話，結果恐怕會有大規模的屠殺。

在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發動的愛國運動的週年紀念日）那一天，成千成萬的大中小學生在街上列隊遊行，高唱國歌並且散發傳單要求全國團結。他們打算去向蔣委員長請願要他停止內戰並援助傅作義將軍在綏遠抵抗日軍。在省府主席的命令之下，警察却向示威的羣衆開鎗，結果有兩個東北軍官的兒子受了傷。城裏的空氣頓時變得緊張起來。